

# 复杂多元的大运河文化空间定位

王 健

## 问题:大运河文化空间定位尚待确立

大运河与万里长城齐名,堪称中华古代文明瑰宝中的双子座,作为中国古代统一国家综合国力最高水平代表的两大世界级人类伟大工程,迄今仍然以其蜿蜒深邃、龙腾虎跃的巨人形象,镶嵌在华夏天地上,不久的将来,与长城一样,大运河将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永世长存!

今天的大运河比长城更具生命力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对京杭大运河山东济宁以南到杭州(宁波)段全面整治改造,形成了鲁、苏、浙长达近900公里的黄金航道,既是南北货物运输、内河通往海洋港口的重要水道,继续承担交通运输重任,同时又发挥着水利灌溉、防洪抗旱、南水北调、城市用水、生态治理、旅游观光等综合功能,成为“活的运河”。从春秋后期经隋唐至元明清迄今的各个时期,大运河线路曾经发生许多曲折复杂的演变,运河沿线各地生态环境南北迥异,历史过程曲折激荡,文化内涵丰富多彩,民俗风情复杂多样,时代面貌变化万千,沿岸都城市镇兴衰沉浮,社会发展跌宕起伏,经济水平差距鲜明,真可谓变幻莫测、博大精深,成为“变的运河”。由“活的运河”与“变的运河”所孕育、繁衍的大运河文化,造就了流动的遗产,活着的历史,成为中国文化多样性、复杂性的宝库,运河沿岸无愧“文化长廊”雅称。

正是由于大运河“活”与“变”所带来的复杂多样性,给大运河文化研究带来魅力的同时,也有许多难以说清道明的问题。古代大运河名称很多,现在学界称唐宋运河为南北大运河,元明清称京杭大运河,交通部门将整治过的大运河统一命名为京杭运河。各时期运河线路的渊源变迁,南北大运河与京杭大运河的交织分野,古今运河航道的混淆纠葛等,这些直接影响到大运河文化研究的空间范围的确定。近年来,学界经常使用“(大)运河区域”或“(大)运河区域文化”,或冠某省市地区的“(大)运河区域”“(大)运河区域文化”的文化空间概念,以此题名或研究对象的论文著作不绝如缕。

今天的大运河(南北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沿岸,呈现出多元的历史文化类型,文化面貌复杂多样,特色鲜明,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完整的区域文化类型。因而,针对不同区域特点所呈现出的文化样态加以甄别、梳理是当下大运河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 环境:大运河沿岸自然环境分界鲜明

早期往往依靠自然河流或山脉来划分区域,自然河流或山脉往往是形成或划分区域的重要标识,这在《尚书·禹贡》中就已经采用:“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相传大禹治水成功后,就是顺着山势开辟道路,砍削树木作为标记,将高山大河定作九州的分界,确定疆域。后来人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打破自然界划分行政疆域。今天的行政区划,就是历史以来在多种因素之下所形成的。

历史上贯穿中国中部、东部、北部,甚至到西部关中的大运河,不是或不完全是自然河流,联结诸多水系,所以一般不像长江、黄河那样称流域,由此称“流域文化”。但从自然地理环境看,古代的运河,其中完全由人工开凿的河段虽然不长,但作用很大,主要是来贯通东西的大江大

河,或南北流向的各条自然河流,如邗沟沟通江淮及之间的诸湖泊,鸿沟沟通黄、淮间诸水,菏水沟通济、泗等等。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对全国,特别是大运河沿线人文地理环境有过细致描述,谈到南北差异时说:“江南泥土,江北沙土。南土湿,北土燥。南宜稻,北宜黍、粟、麦、菽,天造地设,开辟已然,不可张也。”(《广志绎》卷二)而河北以上的运河沿岸,又有赵文化 与燕文化的差异,同时受到长城以北的草原游牧文化的影响。北京成为全国都城以后,其文化尽显帝王气派,采撷了全国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形成了独特的都城文化,这是运河其他城市所无法比肩的。天津明代后才发展起来,海洋与运河交汇,早期属沧州,近代以后崛起,形成独特文化。即使是一个行政区划之内,文化可能也是多元的。以大运河江苏段为例,受自然地理的影响,大致可以划分为淮河以北的徐海文化、长江与淮河之间的江淮文化、宁镇丘陵的宁镇文化、太湖流域的吴文化4个类型,各有渊源,差异鲜明。

## 政区:大运河各段历来分属不同政区

所谓的运河区域,一般以行政区划为准,如京杭大运河沿线,今天有京、津、冀、鲁、苏、浙2市4省,地级以上城市,实际上运河线路变化复杂,古代许多运河沿线,现在已经不在其中。范围广大,涉及今天所说的运河沿线。京杭大运河流经区域按现在的行政区划,沿岸经过城市依次为北京、天津、河北的廊坊(香河)、沧州、衡水,山东的德州、聊城、泰安、济宁、枣庄,江苏的徐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浙江的嘉兴、湖州、杭州、绍兴、宁波,一共23个地级以上城市。以南北大运河计,其政区更加广大,今陕西、河南、安徽等省均包括在内,涉及的城市更多。

古今以来,大运河沿岸区域一直处于不同的政治区域,行政区划从未形成一体。在清代十八省中,北京是都城,全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天津是海运、河运交汇地,城市较晚兴起,河北属于直隶;黄河下游的山东半岛,从来都是相对独立的政区,以泰山沂蒙为界,又分齐、鲁;明清以前,江苏淮河以北多属中原、山东,明清以后,与淮河以南同属统一政区。苏南在明清以前与浙西长期属于一个政区,明清以后与苏北合为南直隶或江苏省。浙东在明以前与浙西分治,明初合为浙江省。政区不同,对经济、文化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淮北与淮南、苏南与苏北、浙东与浙西都有很大差别。

## 经济: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

根据近代以来京杭大运河沿岸城市兴衰历史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可以将运河城市划分为“发达运河城市”和“欠发达运河城市”两组类型。如果不计首都北京和天津两大直辖市,两组城市的空间分布界线大致在江、淮一线,这里正是古代南北地理和经济文化的重要分界线,也是和近代以来京杭大运河沿岸城市的总体发展水平基本符合。在明清京杭大运河通畅时期,长江南北沿岸城市的发展,虽然也存在着较大差距,但在大运河漕运紧张局面推动下,长江以北运河城市也处于高度亢奋的发展时期,像自隋唐宋元以来长盛不衰的扬州,曾经是全国屈指可数的大都市,明清仍然是漕运、盐运的重要枢纽;集黄河、淮河、运河水运水利中心、号称“漕运之都”的淮安,明清时期曾经出现空前繁荣局面。淮关成为名列前茅的税收榷关。其他如山东运河名城济宁、德州、聊城,河北的沧州,

乃至临清、张秋、张家湾、通州等城镇,都有过辉煌的发展时期,相关的历史文献和研究成果的历史描述不胜枚举。大运河中断之后,运河城市的命运迥异,分化严重,导致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如果从1855年京杭大运河中断算起,这种分化和不平衡状况已经持续了150多年,而近年来,这种状况似乎并没有多少实质性改变,甚至区域差距有继续拉大的趋势,制约了沿岸区域协调发展。

近代以来,由于历史、社会、自然条件等多方面原因,目前运河沿线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如果不算北京和天津这两座中央直辖市,运河沿线城市发展明显在GDP、经济密度、人均GDP、财政收入、实际利用外资等方面呈现明显南强北弱态势。临近近海城市好于内陆城市,通航城市优于断航城市,交通方式齐全城市优于不全城水;水资源丰富城市优于严重缺水城市;生态环境好的城市优于差的城市。

## 文化:大运河沿岸呈现复杂多元面貌

在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的明代,按不同河段将漕划分为“七漕”。《明史·河渠志三》:“漕河之别,曰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因地为号,流俗所通称也。淮、扬诸水所汇,徐、兖河流所经,疏濬决排,繫人力是系。故闸、河、湖于转漕尤急。”即以①北京至通州段称通惠河,漕称“里漕河”;②通州至天津段称北运河,也称白河、路河或外河,漕称“白漕”“路漕”或“外漕河”;③天津至临清段称南运河,也称卫河或御河,漕称“卫漕”;④临清至台儿庄段称会通河,也称山东运河,共设节制闸40余座,故漕称“闸漕”;⑤台儿庄至淮阴段是利用黄河,漕称“河漕”;⑥淮阴至扬州段称里运河,也称淮扬运河、南河或高宝运河。中经宝应、高邮、邵伯等诸湖,故漕称“湖漕”;⑦镇江至杭州段总称江南运河或转运河。又以苏州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其北段称丹徒运河,漕称“江漕”;其南段称浙江运河,漕称“浙漕”。“河漕者,即黄河。上自茶城与会通河会,下至清口与淮河会。”到了明朝后期,开南阳新河和加河,清康熙时开中运河,避开黄河,“河漕”不再。民国整理运河和委员会总工程师汪胡楫勘探运河,在《整理运河工程计划》中将运河划分为六段,根据当时的运河状况有所修正,但大致与那相当。这种划分,主要根据运河所经自然河流的自然地理状况,即北京段、天津段、黄河以北、黄淮之间、江淮之间、太湖流域。

大运河沿线包括燕赵、齐鲁、中原、吴越等多个文化区域,文化面貌自古迥然。对大运河沿线城市全国重点文物考察分析可知,除北京外,大运河城市重点文物内涵有明显的南北差别:北方的寺庙多、考古发现的古代遗址多,古墓、古城遗址多,古战场多,革命斗争遗址多,古代文化名人多,呈军事性、尚武文化;南方则文化古迹多,历史文化名人故居多、各类宗教文物多、园林胜迹多、文化艺术成就多、经济商业活动遗址多,与水、海洋、河流相关的遗址多等。

总之,在运河文化研究中,不宜用大运河区域文化或大运河区域这样的空间概念,可以使用大运河沿线、大运河沿岸(城市、地区)文化这样的空间概念,或简称“运河文化”,这既符合划分线性文化遗产定性的国际取向,又与运河沿岸文化多地域复杂多样性的特点吻合。

(作者系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中国大运河南北5000里、纵横数千年的英雄时代已经过去,在无数人关于财富、欲望、飞黄腾达的努力与梦想在波涛间消逝之后,留下的是 一笔深厚得近乎沉重、丰富得至于杂乱的巨型文明遗产,而城市无疑是发现与追寻、传承与创新这一历史文化宝库的关键词和钥匙。

## 运河文明史是运河城市发展史

斯宾格勒曾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也可以说,运河文明史是运河城市发展史。沿运河水陆网络在广阔空间上扩展开去的城市与乡村,它们在社会结构、生活习俗、道德信仰以及人的气质与性格上,无不打上深深的“运河”烙印,是运河文明“基因”的再现与物化。作为独特的河流文明谱系,运河文明的精华集中于两岸的城市或中心城区,又以城市为中心枢纽而延伸到古代中国文明肌体的末梢与细部。如城东门和城北门在明清时期是天津最繁华的所在,原因无他,只是因为这两个城门正对着运河,占到了经济地理上的“区位优势”。又如北京齐化门外东岳庙一带,历来是京城士人辐辏之处,也是因为它沾了运河漕运的光。如《析津志》所述:“江南直沽海道来自通州者,多于城外居住,趋之者如归。又漕运岁储,多所交易,居民殷实。”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以商业为主要标志之一的城市化进程,所以每年3月,东岳庙一带才会出现“道涂买卖,诸般花果、饼食、酒饭、香纸填塞街道”的城市景观。像这样的例子,在运河沿岸城市中是举之不尽的。

大运河与沿岸城市是一体同胞、唇齿相依的。对于运河城市,它们或是由于运河开通而直接完成了自身的“城市化进程”,从默默无闻的农村或普通市镇发展为具有相当规模或中心意义的大城市。如山东临清,就是由于大运河的开通,把它一个叫“鳌头矶”的水洲改变为一个重要的运输与物流中心,同时也使临清一跃发展为“绅士商民近百万口”的明清中心城市。清人贺玉昌在诗中曾说它“舟车辐辏设新城,古首繁华压两京”(《题清源》其二),这并不是诗人的想象,在明清时期,临清是华北最大的棉布、绸缎和粮食等商品集散和贸易中心。在明代经临清转销的布匹和纺织品每年至少在一二百万匹以上,在清代每年经由这里交易的粮食则达到500万石至100万石。以乾隆年间为例,临清城内粮食市场有六七处,粮铺多达百余家。又如唐宋时期的常州,当时江南运河西自朝京门外广济桥入城,经西水门出东水门后穿城而过,使常州获得“三吴襟带之帮,百越舟车之余”的声誉。如著名古建筑家罗哲文先生说:“如果没有这条运河,北京城可能就修不起来了。”故宫太和殿的龙柱、铺地的金砖等,也包括城市建设需要的大量木材与石料等,都是通过运河运来的。此外,100年来,北京人吃的大米都是由运河运来的。

许多城市的命运与大运河的兴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扬州为例,在京杭大运河走向繁盛的唐代,扬州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大都市,商贾云集,店铺栉比,各种货物从高档的珠宝绫罗到日常生活用品,精美华丽,应有尽有。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扬州的生活总是沉浸在一派热闹、繁华、喧嚣的气氛之中。真正

使扬州命运发生逆转的,是另一种现代交通系统取代了大运河。如现代作家郁达夫所说:“铁路开后,扬州就一落千丈,萧条到了极点。从前的运使、河督之类,现在也已经驻上了别处;殷实商户、巨富乡绅,自然也迁到上海或天津等洋大人的保护之区,故而目下的扬州只剩下了一个历史上的刹制的虚壳,内容便什么也没有了。”

## 运河城市代表了经济型城市的中国模式与经验

与人工开凿的大运河关系如此密切,使运河城市与其他城市在作用上有很大的区别。西方城市社会学家认为城市起源于防卫的需要,在这一点上有其他城市不能比拟的巨大区位优势,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总体上“喜静不喜动”,容易走向自闭与僵化,因而在运河两岸出现的这些活力充沛的城市,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自我更新与可持续发展,其功劳怎样评价都不为过。

压迫其他城市的规模与实力,如朱元璋就用力压制中古时期最富裕、城市化程度最高和最先进的经济文化中心苏州。而经济城市的基本功能 是扩大生产规模、贪婪地占有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以便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与它最突出的城市性格是一种“永无休止”的浮士德精神。如果说,政治型城市趋向封闭,对中国社会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那么经济型城市则倾向交流,那么社会会有活力与创造性的集中体现。在泛政治化的中国古代城市中,运河城市代表了经济型城市的中国模式与经验。如同有机体一样,社会的发展也需要不断地扩大交流,依赖河流文明而出现的运河城市,在这一点上有其他城市不能比拟的巨大区位优势,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总体上“喜静不喜动”,容易走向自闭与僵化,因而在运河两岸出现的这些活力充沛的城市,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自我更新与可持续发展,其功劳怎样评价都不为过。

## 大运河孕育出独特的城市文化形态与景观

与运河城市本身一样,依托于独特的地理、经济与社会条件,在文化冲突、碰撞与交流中,大运河还孕育出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与景观,而不仅仅只是一条南北、东西或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从文化类型上看,与古代主流的农耕文化不同,运河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城市文化;从城市功能上看,运河城市超越了“政治型”与“经济型”的二元对立模式,是两者在中国古代融合得最好的城市发展模式;从生活方式上看,与安土重迁、专制保守的农业社会不同,在运河文化中包含了极其丰富的现代城市要素。在今天看来,最可注重的是运河城市文化的开放性与多元化,它们既对中国古代社会向更高水平发展起到重要的刺激与推动作用,又在岁月沧桑中逐渐演化成为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与遗产,是研究中国当代城市社会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本土性对象。

如同运河城市一样,运河城市文化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同时也因其特有的一个河流文明背景而有多数值得探究的秘密。单崇翔先生曾将大运河文化遗产具体描述为9个特征:“它是一项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共同构成的混合遗产;是静态与动态共同构成的活态的文化遗产;是由点、线、面共同构成的文化遗产的廊道;是由古代遗址、近代史迹还有当代遗产共同构成的中国文化遗产;反映了普通民众生产生活的工业遗产、乡土建筑等遗产;包括了物质与非物质共同构成的文化空间。”(李勤:《大运河保护应遵循“原真性”“完整性”》,《光明日报》2007年3月12日)这充分说明了运河文化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未可限量的当代价值。沿着大运河曲折两岸的城阙,在或急或缓的碧波间挖掘与重建曾经的繁华与梦想,重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大运河文化,这对于发掘运河城市的传统文化底蕴、展示运河城市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魅力以及培育它们的当代城市精神和发展运河城市文化产业,无疑是必要的与重要的。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

刘士林

# 大运河与中国城市的历史、社会及文化

在《墨子·七患》中也有“城者,所以自守也”的记载,人们普遍认为汉语中“城”的本义是城垣,主要功能也是防卫,因而防卫功能也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重要原因与基本内涵。在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万里长城,它的功能即“自守”,是中国一个最大的城垣。与之相对大运河的主要功能则可以称之为“市”,它的基本功能是“买卖所之也”(《说文解字》),是“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易·系辞下》)。与“城”因防卫需要而倾向于封闭不同,“市”的功能在于推动内部的循环与交流,这在客观上有助于使中国社会因为更广泛的交流而成为一个内在联系更加密切的有机体。

强大的交流功能集中体现在运河城市身上,在表层是实用性的交通、物流、商贸等,而在深层则直接建构了城市的存在方式与运行机制,形成了不同于“政治型”的“经济型”城市模式。这两者的区别在于:政治型城市的首要功能是如何聚敛与控制社会生活资料与物质财富。为了更有效地强化统治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秩序,传统政治中心一般会自觉不自觉地限制、

(上接第十三版)如《云冈石窟保护条例》等。据初步统计,目前,在国家层面世界文化遗产可以依据的法律2部,行政法规3个,部门规章1个,规范性文件7个。

二、完善管理机构。国家文物局于2002年成立了世界遗产处,于2011年2月在文物保护与考古司正式加挂世界文化遗产司牌子,负责全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保护和管理等工作。各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政府也建立了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负责日常保护、管理、监测等工作。

三、建立监管体系。逐步建立了文化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国家文物局《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专家咨询管理办法》和《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审核管理规定》等制度,基本完善了世界遗产从申报到保护、管理、监测等的完整监管体系。

四、实施保护工程。对世界文化遗产实施本体保护时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规划先行、原址保护、最小干预、不改变原状、保护遗产环境、不在原址重建等原则。

中央财政设立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并逐年加大投入力度,确保世界文化遗产本体及其环境的安全。国家文物局组织中国高水平科研机构进行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科研,重点推进全面排除遗产险情的重大保护工程。同时,中国

政府自2006年来组织实施了长城资源调查工作,对地跨16省市区、长达2万多公里的各时代长城进行全面调查和认定,计划于今年6月公布长城资源调查和认定成果。

五、重视研究宣传。国家文物局鼓励多学科、跨领域开展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综合研究,逐步建立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先后委托相关单位开展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修订和“文化景观”“文化线路”“遗产地与经济社区”“遗产地保护区划”“遗产地与社区”“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建设”等具有前瞻性的课题研究,为世界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夯实了理论基础,提升了软实力。

六、注重国际交流。国家文物局与相关国际组织共同主办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第15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大会、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木结构彩画保护国际研讨会等,积极引进国际先进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也增进国际同行对以中国文

化遗产保护传统理念、方法的认识和理解,并形成了一些有影响的国际文件。

## 面临的挑战

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巨大挑战,有时甚至更为尖锐。全球气候变暖以及极端天气的频繁出现对中国世界遗产造成很大影响。2008年5月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不仅夺去了很多宝贵的生命,也对世界遗产青城山都江堰的古建筑群造成了很大破坏。越来越频繁的台风挟裹暴雨,对福建、广东等地的遗产本体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大规模的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与旧城改造是我们面临的又一挑战。一些不当的新农村建设破坏了历史村落的格局、环境和风貌,割裂了人与自然长期互动形成的和谐关系。城镇化迅速吞噬城市周边的文化景观,大量农村人口的涌入迫使历史城镇的街巷尺度、交通吞吐量、建筑密度及基础设施因扩容而面目全非,国际社会关注的历史城市景

观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此同时,历史村落人去屋空,历史建筑因缺乏维护而损毁。错误观念指导下的旧城改造常常造成历史街区被打打造为“假古董”的仿古一条街或成为焕然一新的街区,失去其遗产价值。

世界遗产地面临着巨大的旅游压力。绝大多数遗产地一旦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游客量就会激增。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审议缔约国世界遗产申报项目时,越来越关注遗产地是否就此做好了充分准备、实施了科学防范。

## 加强保护管理促进可持续发展

除了做好常规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还应该在推进“5C”战略的实施水平,促进世界遗产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它们包括4个方面:

一、基于遗产价值的保护。价值是遗产的根本,没有了价值一切利用都是空谈。在合理利用世界遗产谋求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应尤其重视对世界遗产价值的保护。世界遗产因其具有超越国界的

重要性和价值,即“突出普遍价值”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发展宣言》(2001年)论述了遗产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发展不仅限于经济增长的层面,也是获得更多知识、情感、道德、精神等方面满足的途径。”因此,考核遗产地管理者和地方政府的政绩时不应只看遗产地挣了多少钱,更重要的是要看遗产地对当地居民的自豪感和归属感,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做出的贡献;要看对青少年的启迪、教育作用;要看遗产地作为精神家园,满足了在社会关系和人文环境迅速变迁的现今社会中,人们对祖先的思念和对旧日时光的缅怀以及追求内心平和的渴望。

三、基于预防为先的保护。在全球同庆《世界遗产公约》4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历史、总结成绩,同时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世界遗产保护日益复杂化、愈加艰巨化,因此也更加努力地寻求实践全球战略、制定可行对策的有效途径。全球

气候变化以及自然灾害在威胁着遗产,城市化、现代化、快速经济发展的压力在威胁着遗产,迅猛发展的旅游业带来的挑战在威胁着遗产,我们必须与各种威胁抢时间,与各种挑战作抗争。有效的武器之一就是及早发现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积极主动的预防性保护。目前,设于中国文化遗产院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监测中心,已初步完成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建设规划编制,十几处世界遗产地也提交了监测预警试点工作方案,中国世界遗产监测预警工作将逐步实现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和常态化管理。

四、基于惠及民生的保护。世界遗产的保护不仅要保护好核心遗址、建筑及其周边环境,也要保护好遗产地的民众利益。是人民创造文化、传承文化,他们的文化权益理应得到更好的保护与实现。我们不仅要保护遗产地的“硬件”,更要保护遗产地的“灵魂”。世界遗产保护及其可持续发展应提倡科学保护,惠及民生,充分调动社会民众的积极性,使每一个人都成为文物保护员和志愿者,从而达到持续保护和利用的目的。政府应最大程度地发挥主导作用,在保护策略上正确引导,资金上给予支持,技术上提供帮助,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实现遗产保护和惠及民生的共赢。